

论转型社会工作（笔谈）

编者按：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专业慈善力量的社会工作，自身应该有怎样的定位与认识、理论何以有效指导实践及如何培养专业型的社会工作者，日益成为学术圈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2010年仲夏，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高校的社会工作学人、实践者，齐聚广州市首届中国转型社会工作非正式论坛，就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论题展开激烈交锋。本刊特延请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维度阐述对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解。期望本组笔谈中这些差异性 or 相似性的观点能够引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包括 NGO 界对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本质、使命、策略、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论争，以便正本清源并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转型；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教育

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张和清^{*}

论及中国现实处境下社会工作与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关系，笔者认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是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向社会工作原初的精神及其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故而需要先澄清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需要转变？二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回归？基于此再讨论社会工作回归的方向及其可能的行动策略。

过去十年笔者在云南、四川、广东三省农村持续参与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对中国边远乡村基层农民的困苦处境感触颇深。当从田野返回学院深刻反省农民“生产致贫”、“消费致贫”、“教育文化医疗致贫”、“自然灾害致贫”等社会现象时，笔者发现，农村贫困（包括频发的自然灾害）其实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发展主义）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息息相

关。对于大多数边远的农村、农民和农业（或大多数社会底层）而言，发展是幻象。^① 农业市场化，消费主义，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产业化和各种自然灾害，不仅不同程度地造成农民生计困难，还导致传统文化衰落，生态危机等连锁反应。这种经济增长—文化衰落—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众所周知，目前引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技术是功能主义取向的，强调问题个体化，主张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决“案主”的问题^②。这是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③ 于是在中国的专业语境中，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要么被简化为三大方法（个案、小组、社区），要么被神化为无所不能，不是割裂地强调透过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以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社会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认

* 作者简介：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① 参见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全球化发展模式也称“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的信念。第一个质疑“将发展定为目标的可取或可行性”的人是沃勒斯坦，他通过5个启蒙式的提问引出“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结论是：发展是幻象。受其观点启发，反观项目点所在的几个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发展的幻象。

② 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工作的“案主”即是个体，此外，还指涉一个完整的社群或社区等。在功能主义看来，“个体”相对于整体永远是问题，因此，功能主义社会工作所谓的“案主”除了问题人之外，还包括问题群体（如族群等）、问题社区、问题村落等等。

③ Malcolm Payne,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朱志强：《社会工作的本质：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载何国良等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第94页。

为社会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似乎“社会工作方法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专业实务是割裂的、专家为本的临床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家自己精通何种理论和技术，就“对号入座”地诊断“案主”的问题并实施矫治。将个体的困扰简化为心理疾病或群体症候，忽视精神疾病的社会根源，是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这种问题个体化或救助式的工作，其结果是强化“案主”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会工作的无力感。

毫无疑问，临床社会工作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更不能改变社区贫困及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困局是：在宣称社会工作是利他主义的科学助人服务活动的同时，临床社会工作服务（实务）又无法满足社区民众最迫切的生计、生活、文化认同、环境保护、民主参与，包括深层恐惧等方面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专业社会工作不断被诟病为违反社会公正的原初信念，是“堕落的天使”。^①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角^②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而临床社会工作又将完整的个人需求割裂开来解决问题。这导致社会工作在失去社会分析能力的同时，陷入解决问题（或个案工作）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因此，笔者呼吁社会工作应该摆脱功能分析和临床救助（包括单方面提供服务）的困局，从修修补补中解放出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

事实上，社区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于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环境的接触面（interface）：作为结构的环境是透过社区或日常生活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agency）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因此，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致力于系统化的双向改变：通过重塑社区社会文化氛围，一方面激活个人能动性，恢复个人、家庭、邻里等良好的生计、生活和自然环境，使个人困扰得到舒缓；另一方面从长远计，当越来越多的社区逐渐恢复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时，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包括全球生态政治）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策略就是通过城乡社区的再造，逐渐恢复社区可持续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民众面临贫困与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困扰时，社区再造应该从推动社区可持续生计入手，通过经济赋权实现社区政治参与、文化传承、社会互助、性别平等、生态保育等等。目前笔者参与推动的“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项目，正是社区再造的尝试。

该项目扎根行政村，从事农村社区组织工作。通过与底层村民长期同行，将社区动员与组织起来，发育生产互助小组（条件成熟时注册合作社），然后根据村民的优势和资产状况，推动村民一起刺绣、种植红米、养殖土鸡、改造老旧古屋等。与此同时，项目团队在城市社区建立消费者网络，创办公公平贸易店，举办社区沙龙，等等。当农村生产出优质的农副产品和精美的绣品，准备好“修旧如旧”的乡村旅社或民宿时，项目团队全力将乡村和社区联动起来，通过城乡民众共同议价直销、社区“共同购买”、公平贸易店销售、乡村生活体验游及居民产地购买等形式，推动社区支持“三农”，村民也惠及居民。实践证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尝试，使生产者免除中间商剥削，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使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农副产品，实现了互惠互利。通过刺绣、土鸡交易和经营乡村旅社等，提高了妇女经济地位，家庭分工及其性别权力关系开始改变。与此同时，村民开始意识到传统种养技艺、刺绣手工艺、祖先留下来的建筑等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得以提升。无论是互助生产和交易，还是合作运输农副产品，社区互助的传统得以延续。依靠种养殖业保障生计的村民会自觉保护自然资源，不施用化肥、农药、添加剂的老品种耕作，除了保护传统种子和耕作文化外，水土污染得以改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总之，城乡合作、公平贸易作为社区再造的另类尝试，不仅改善了乡村社区最弱势群体（妇女）和最贫困群体的生计状况，而且通过社区民众经济赋权，逐步实现社区社会文化、政治和性别赋权。最重要的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策略能够推动社区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从而撼动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①参见 Harry Specht & Mark E. Courney,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②参见 [美] 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